

NEHAU HONGKONG FORUM

ASIA

私募基金

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 
理事长戴相龙透露——

社保基金将选投  
3至5家私募基金



戴相龙在发言。 本报记者 张杰 摄

本报博鳌4月19日讯（记者单偉岗）  
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今天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“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”分论坛上透露，今年社保基金将至少选择3-5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(PE)进行投资，在投向的选择上将更多地支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。

戴相龙表示，去年以来与全国社保基金进行联络的国内外的PE有近100家公司，提出募集资金的已经有近20家。“我们今年至少将在其中选择三家到五家。”他透露说，国务院将会大力支持PE的发展，国家发改委已经会同有关部门基本完成了PE管理办法的起草，目前正在等待早日上报决策层审批。

戴相龙在介绍PE选择的标准时说，一要制定管理办法，最重要的是通过中介机构选择，二是要看业绩，无论原来的公司还是新设公司，关键要看核心管理人员的业绩；三是要按照合伙法承担无限责任。

在谈及社保基金的投向时，戴相龙认为社保基金要更多地支持中小企业和科技发展，更多地把关注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、扩大消费。目前，中国的风险投资基金和PE的发展已有很好的基础。自2006年天津设立首家总额为200亿元的产业基金后，迄今经国家发改委审批和备案的产业基金或PE已近2000个，地方政府审批备案的更多。

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中央政府集中的社会保障资金，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储备，主要用于弥补今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社会保障需要，被大家形象地称为“全国人民的保命钱”。因此，其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全国人民关注的目光。

NEHAU HONGKONG FORUM

ASIA

电视辩论

经济增长模式应从  
制造业转向服务业



4月19日，“博鳌电视辩论会”主持人宋马丁在向嘉宾提问。本报记者 林萌 摄

本报博鳌4月19日电（记者单偉岗）  
在今天傍晚召开的“博鳌电视辩论会”上，专家们认为，中国的一个竞争优势在于改变增长的模式，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。

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说，金融危机让全球的情况发生了变化，对中国、对亚洲总产品的需求相对下降。大家知道中国需要增加消费，增加内需，但中国仍然非常贫困，人均GDP收入还只有3000美金。中国13亿人口中，35%的劳动力仍在农村，金融危机又让2000万人不得不回到农村。下一个阶段如果中国希望继续增长，就必须要做到两点，一方面是坚持出口，另一方面是加强国内市场的发展，要尽可能两条路同时前进，这样才能进一步保持现代化、城市化和工业化。

美国总统前经济顾问拉特里奇认为，一项政策只要能促就业的就是好政策，毁坏就业机会的就不是好政策。服务行业的就业机会，包括扩大建设通讯网络，扩大教育体系的质量等。中国和美国经济体之间不同之处就是，美国是资产密集型的经济体，美国经济要死掉很难。

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表示，如果能够重点把低端、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转到高附加值的制造业，从制造业转到服务业上，中国保持6.1%的增长速度，保持完全的就业，这是相当不错的情况。不过，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够，很多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。中国需要高增长率吸收劳动力，如果我们改变经济增长模式，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，中国就不再需要两位数的增长率。因为服务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，可以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，甚至比制造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。

美国  
总统前经济顾问拉特里奇：  
经济危机的最坏时刻已经过去

新华社博鳌4月19日电（记者樊曦 赵晓晖 董佳 陈雍容）  
美国总统前经济顾问拉特里奇在此期间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，经济危机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，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逐渐变好的阶段。

“中国的经济危机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，而美国仍处于衰退的底部。全世界的资本市场正在以良好的态势恢复。”他在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上告诉记者。他指出，世界实体经济和薪酬水平目前

还没有触底，但也已经接近底部，并有很大的可能在今年年底开始恢复。

对于中国经济，他表现的更为乐观：“我原先认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会在5%到6%之间，但近期的经济信号让我认为这一数字太低了，现在我们更有可能把预期调至6%至8%。”

拉特里奇认为，从经济增速来看，中国将会比美国恢复得更迅速。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本身几乎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，在今

后为经济增长带来更多的生产力。

他说，中国的刺激计划也将建立一个社会安全网络，因为基础建设将会为农民工等群体带来更多的收入，从而把财富带给相对贫困的城镇以帮助它们成长，这对于长期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。

拉特里奇说，中国并不需要更进一步的刺激计划，因为目前的现有计划设计完备，收效迅速，覆盖面广，并且针对了最需要帮助的人群。

“我觉得已经几乎可以宣称成功了。”他说。拉特里奇还指出，亚洲经济目前已经高度集中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互相依存度很高，而这场经济危机也将促使亚洲地区的结合更为密切，催生更多政府间的合作，整体经济增长将拥有稳定的驱动力。

NEHAU HONGKONG FORUM

ASIA

专访



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发言。 本报记者 林萌 摄

国资委主任李荣融：  
国企减薪要从高管开始

本报博鳌4月19日电（记者单偉岗）  
在今天召开的“危机中求发展：企业过冬的战略选择”分论坛上，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指出，国有大企业在应对金融危机时，如果要减薪，必须从高管开始。

李荣融说，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，也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。这次经济危机是美国的大银行、大企业开始的，说明大企业的危机会引发国家的危机，也会引发全球危机。因此大企业更有责任挑起稳定经济

的任务。金融危机中，大国企业要做到“四个必须”：公司治理必须有新的进展，企业的组织架构必须做出重要的改革，企业的信息系统必须做出新的升级，员工队伍素质必须有新的提高。

李荣融表示，企业很难改变环境，只能适应市场和环境的变化。金融危机中企业首要的是把变化了的市场做个透彻了解，并把这些信息如实的、透彻地告诉员工。创新是企业的永恒主题，但必须搞清楚创新是为了什么。创新不为了别的，是为了满足市场要求，必须来自于对市场的准确

判断，舍此就是企业的灾难。

李荣融认为，国企首先是经济组织，不是慈善基金会，企业领导的薪酬必须跟业绩挂钩。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也是有价位的，人的能力的标志就是能否让企业赚钱。金融危机下，CEO和高管们要首先挑起应对困难的责任，如果要减薪，首先必须是高管先减，而不是先让员工减薪。李荣融承诺，央企上交的红利会在目前最高10%的基础上，逐步提高。央企一定要向社会，向国家持续不断地提供良好的回报。

央企3月利润  
环比增长近86%

本报博鳌4月19日电（记者单偉岗）  
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今天透露，央企3月份指标出现了明显回升。

李荣融表示，央企对中国非常重要，因为央企提供的税收占国家整个财政收入的25-30%。3月份，央企的利润较2月份增长了近86%，营业收入虽然比去年同期下降5.4%，但是仍然较今年2月份上升26%。央企口袋里现在不缺钱，说明他们为过冬所采取的措施已得到了反映。

他指出，这仍然是谨慎乐观，不可盲目进行抄底收购，因为收购不是有钱就能解决的，企业做事都不能超过自己的能力。否则，集团越大，垮得越惨，影响就越大。

NEHAU HONGKONG FORUM

ASIA

电视辩论

魏家福  
妙解“赢”字

本报博鳌4月19日电（记者单偉岗）

在今天上午召开的“危机中求发展：企业过冬的战略选择”分论坛上，中远集团总裁魏家福以妙解“赢”字的方式，阐述了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。

他说，“赢”字最上面是个“亡”字，金融风暴不是一般的风暴，如果准备得好的话企业就有机会，但如果还要赢的话，就得想到哪些事儿会导致你的死亡，必须切断导致死亡的道路，那么你才会赢。

“亡”字下面是一个“口”，这指的是你的宣传、沟通、战略，就是要让大家明白你的意思，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够给予你支持。

“口”字下面左边第一个字是“月”字，就是月份，一年12个月，你的每个计划都必须根据日程、计划来做。中远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，比如在香港上市，然后又回到A股市场，都是有严格的时间表。“我做总裁就是检查时间表，其他的事儿都让我手下的人去做。”

“月”字右边是个“贝”，贝就是钱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没钱，没有现金的话就不可能获得成功。中远两年之前就拥有700亿元的现金，根本不担心危机。而且现在中远又和中国银行签了一个协议，他们会给中远700多亿的授信。

最后一个字是“凡”，就是平凡，就是遇到金融风暴的时候要平常心。“我作为中远的船长，作为导航员，在出港的时我就要想这次旅行当中有可能会遇到台风、飓风，怎么做呢？就是事先做好准备，未雨绸缪。”

他最后说，危机有风险，但对于那些做好准备的公司来说，就是个机会。中远集团就是在等着这样一个机会。

众老总畅谈企业“过冬”——  
应对金融危机企业要有战略选择



面对金融危机，企业如何作战略布局？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裁魏家福(中)认为，应对金融危机企业有三种选择：即冬眠、冬泳、冬训。 本报记者 林萌 摄

本报博鳌4月19日电（记者单偉岗）  
面对危机，众多企业的第一反应是裁员、减薪、降低成本，力保利润和现金流，但也有些资产负债状况良好的企业，把危机视作战略布局的难得契机，以求在日后的全球竞争中立于更高的起点。他们思考的问题是，危机中蕴藏着哪些机会，应该采取哪些战略？

中远集团董事长魏家福认为企业应对金融危机可有三种战略选择，一是“冬眠”。就是减少投资、削减人工、降低成本，回归企业核心业务，同时确保现金流充足。如果冬天很短的话企业还能生存，但假设冬天很长的话，冬眠的企业就没法生存下去，因为他们的现金流会断裂，所以这只是企业的最后一个选择。

二是“冬泳”。就是逢低并购，这样能够锻炼自己的能力。但冬泳是很危险的，

因为有可能在游泳当中被冻死。所以只是一般战略。

三是“冬训”。一般公司每五年经历一个起伏周期，企业要根据经济周期的规律，在经济触底的时候做更多的训练，这样才能为可持续发展做好准备。冬训包括改进风险管理体系，对市场趋势及企业定位做更好的思考，然后去调整未来的发展战略。这是企业在金融危机中能够做的最好的战略选择。

台湾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秀莲表示，商业银行在金融风暴里重要的是协助企业渡过寒冬，因为银行健全是建立在客户的健康之上。透过银行工会的协商机制，如有企业经营正常，但还款有困难时，台湾银行会延长还款期，还会召集债权人很快地达成协议，只要有1/2的债权人同意，就不去紧缩企业的银根。这样能让银行贷款在风暴里能维持一定水准，不

至于紧缩。

塔塔集团已有130多年历史，面对的竞争一直非常激烈，包括无数次金融危机，但一直非常有活力。这是因为他们一直保持创新，在技术上有日新月异的变化，所以有非常强的抗风险能力。塔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拉马多莱今天表示，应对金融危机必须有远见，不要只盯着下一季度的增长。在金融危机时，要通过培训提高员工素质，对流程和技术进行投资，采购一些提高生产效率的工具和解决方案，加大研发的投资力度和内部策略的管理。“这样完全可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。”

NEHAU HONGKONG FORUM

ASIA

企业“过冬”

贸易保护主义必须予以抵制

新华社记者 孙志平

NEHAU HONGKONG FORUM

ASIA

时评

温家宝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，明确提出密切经贸合作，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张，这一态度，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政府重视促进自由贸易的坚定立场，再次发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强音。

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以来，一些国家迫于国内政治、经济压力，纷纷出台贸易保护措施。从奥巴马“新政”中的“购买美国货”条款，到欧盟对奶酪、黄油和奶粉的出口补

贴，无不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。世界银行报告披露，自去年11月G20华盛顿峰会至今年2月，20国集团中已有17个国家出台共47项贸易保护措施。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，保护主义之风不断扩散，给世界经济复苏罩上了一层阴影。

危机之时，中国秉持开放理念，彰显了负责任大国形象。在金融危机冲击下，中国虽然也遭遇了经济增速放缓、出口下滑、就业压力加大等困难，但仍以实际行动携手世界各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。2月下旬，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率中国贸易和投资促进团访问欧洲四国，签下约130亿美元的订购单。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中国反对保护主义、避免政策内顾的举措，成为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的一大

亮点。

历史的经验证明，贸易保护没有赢家。1930年，为了应对经济危机，美国颁发《斯穆特-霍利关税法》，对2万多种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，结果引发世界贸易大战，成为大萧条加剧的催化剂。直到罗斯福政府实行新政，与贸易保护主义决裂，美国经济才逐步走出低谷。历史是一面镜子。任何针对他国的贸易保护举措，不仅会损害对方，最终也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

贸易保护主义抬头，使世界贸易遭受到更加沉重地打击。世界贸易组织发表的预测报告称，今年世界贸易总量将下降9%，是自二次大战以来最大的降幅。如果任其发展，一旦引发跟风效应，很可能会酿

成严重的经济悲剧。为此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在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上呼吁：必须让人们认识到保护主义不能保护我们的真正需求，采取保护主义是最糟糕的反应。

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，保持国际贸易渠道畅通，保证国际贸易健康发展，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。贸易保护主义拯救不了世界经济。在这条道上，只能越走越黑，必须坚决予以反对。相反，贸易自由化，既有助于地区商品流通，形成规模经济，又有利于推动各国之间的生产分工，从而实现各国共赢的局面，必须认真予以坚持。

（新华社博鳌4月19日电）

NEHAU HONGKONG FORUM

ASIA

价格波动

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  
谈初级大宗商品——

价格大幅波动  
给中国三个教训

本报博鳌4月19日电（记者杨春虹）  
作为初级大宗商品的进口大国，中国能否承受该类商品价格大幅度波动之重？如何来防范这种价格波动造成未来更多资产泡沫形成的风险？今天上午举行的“价格波动与新兴经济体对策”分论坛上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直言中国在这方面必须吸取三个教训。

在过去几年当中，初级大宗商品的价格不断上升，2008年价格波动幅度尤其厉害。例如原油价格在去年的第四季度已经暴跌到了每桶45美元，是它去年7月最高油价的30%；铁矿石现在价格也只有去年最高价格的35%；粮食价格和最高峰相比也是只有40%-50%。

张晓强说，初级大宗商品价格在这么短时间里经历如此剧烈波动，显而易见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。

张晓强认为，中国在其中应该吸取三个教训：首先是一定要有一个高效合理的定价机制，这一定价机制能够准确反映比如矿产品、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特征和供需关系，同时也要能够反映开采这些大宗商品对于环境的影响；这一定价机制还必须还能确定大宗商品价格与农民的利益。因为中国农村人口近8亿人，粮食价格偏低的话会严重损害农民利益，但是如果粮食价格过高的话，也会严重增加消费者的负担。

第二个教训，对于初级大宗商品的价格而言，需要国际合作来监管投机行为。今后在这方面不但要考虑到经济形势，考虑到供需关系，还要考虑到其他因素，比如政治影响对油价影响。另外还有对冲基金，对冲基金对于初级大宗商品价格影响也是很大的。就像金融危机这个形势一样，大家现在也都理解了，也就是缺乏监管以及金融机构的大规模的不负责任的行为，特别是不负责任的衍生品发展，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要负很大责任。

第三个教训，中国必须积极地通过国际贸易、通过对外投资，并且也通过我们中国的企业，积极的参与到有关谈判当中，来制定一个正确的国际初级商品定价机制，这样使得中国能够积极地利用在我们之外的这些自然资源，我们虽然是最大的买家，但是我们在定价机制方面的发言权还是不够的。

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  
傅成玉快人快语直面提问

拿高薪再捐出去  
是我的自由

本报博鳌4月19日电（记者杨春虹）  
本来主要是谈价格波动的问题，结果听众的问题却集中其它敏感方面，以至于主持人不得不再三“阻止”，而被一再追问的人正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傅成玉，不过爽直的傅成玉给出的回答也干脆利落，让许多现场记者大呼“过瘾”。

在这些尖锐问题中，一是问其会不会从政，他说“不可能”；二是问为什么拿了高薪后又捐给自己的母公司，这对海外投资者是否是一种欺骗？傅成玉说：“给了我，我拿到了，我再捐出去，这是我的自由。”

傅成玉说本来现在在金融危机的时候不想评论这个事，但既然你提了，我就回答一下。傅成玉说国内报道说我拿了1200万元，我解释一下原因，因为中海油是上市公司，治理结构是和所有国际公司相同。薪酬都是由独立董事制定，他们制定的标准是和国际同类公司相比，如果我们收入太低了，独立董事不放心，投资者对中国都不放心。说你们收入这么低，怎么能管好我们的钱？所以说这是市场的原因。

那为什么拿到钱又要捐出去呢？傅成玉说，因为这样的薪水和中国国情相差太多，我们不可以拿这么多，我们员工收入太低。所以我拿到后，再捐给母公司，没有欺骗一说。“怎么叫欺骗呢？给了我，我拿到了，我再捐出去，这是我的自由。”

“我让大家反思一下，西方国家靠高工资、高收入的管理层，最后把企业搞垮了。我没有拿那么高工资，我们拿国内工资，把公司发展好了，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”傅成玉反问道。



傅成玉爽快回答听众提出的敏感问题。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